

# 《汉官私印泥封考略》的多线编纂与校补

——以“上图稿本”和“潍坊稿本”为中心

李柯霖 刘 昕

**内容提要：**《封泥考略》是中国古代封泥研究中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著作，由吴式芬、陈介祺二人同辑，吴重熹编校。其稿本《汉官私印泥封考略》的相关情况也颇值得关注，但学界尚未完全厘清，多停留在概述层面，且未过多关注潍坊市博物馆馆藏稿本。本文旨在梳理上海图书馆、潍坊市博物馆所藏《汉官私印泥封考略》稿本的现状、撰写体例等内容，兼及吴、陈二人的封泥收藏。通过比较“上图稿本”“潍坊稿本”与《封泥考略》之关系异同，探讨两种稿本的编纂时间、多线进行的校补过程以及其他稿本存在的可能性，进一步揭示《汉官私印泥封考略》稿本的重要价值与意义。

**关键词：**《汉官私印泥封考略》 吴式芬 陈介祺 稿本

封泥，或称泥封，它的发现是晚清金石学的重要成果之一。自道光二年（1822）蜀地出土封泥后，遂引起世人的关注。陈介祺（1813—1884）与吴式芬（1796—1856）便是较早关注并涉足收藏封泥的人物，两人早年既定金石之交，自道光后期始有将各自所藏封泥陆续编录成书，但因其各种

原因，多数今日未见。最著名者，当属两人同辑的《封泥考略》，它是中国古代封泥研究中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著作。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初辑，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石印本正式刊行，扉页篆书“封泥考略”四字，牌记题“海丰吴氏、潍县陈氏所藏辑成十卷，光绪甲辰（1904）之秋印于沪上”，内署“海丰吴式芬子苾、潍县陈介祺寿卿同辑”。目录中每枚封泥分别以“吴藏”“陈藏”标识，正文中每面一拓，并于左下角钤“双虞壶斋封泥”“簠斋藏古封泥”以示区别，左为考释文字。（图1）全书收录秦汉官私封泥846枚，其中陈藏575枚，吴藏271枚。逐枚考释，首开利用封泥文字证史、补史的范例，对研究秦汉官职、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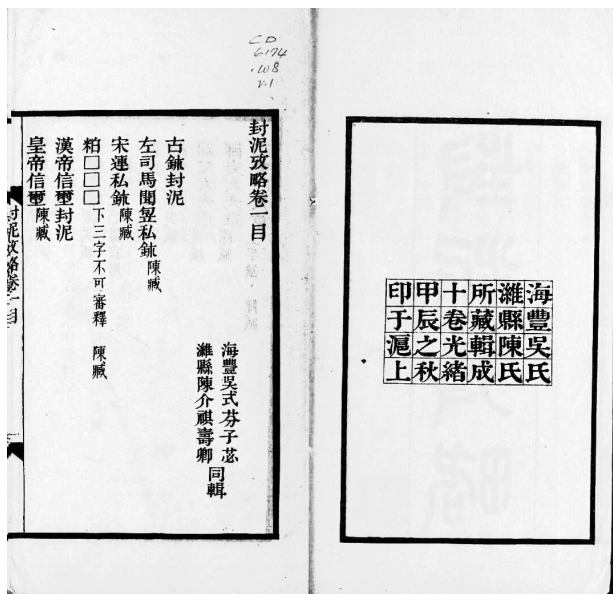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《封泥考略》石印本



图2 《封泥考略》付印底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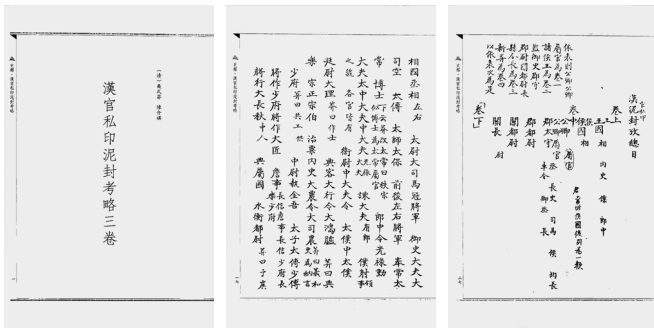


图3 《汉官私印泥封考略》稿本（“上图稿本”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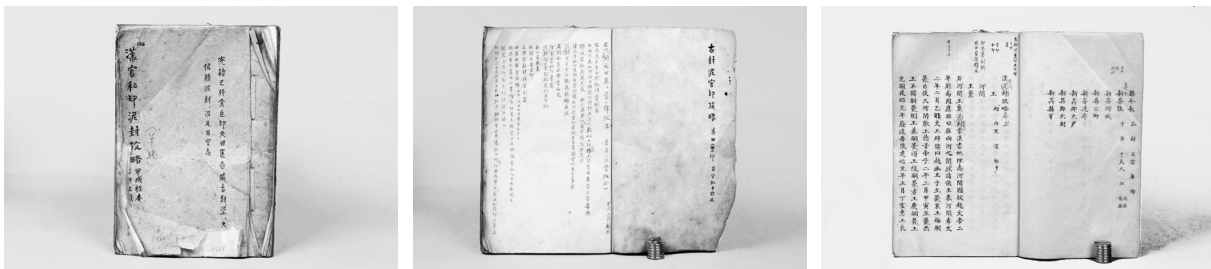


图4 陈介祺批注校订《汉官私印泥封考略》稿本（“潍坊稿本”）

理以及篆刻艺术创作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。

此书刊行时吴式芬已谢世48年，陈介祺已谢世20年。书内既无序跋题记，题署亦未见书者具款，与同时期的金石考据著书成例极不相符，也使得对这一重要著作的成书过程茫然不知，颇具神秘。庆幸的是，《封泥考略》的付印底本现存上海博物馆（图2），它保存着原始的面貌，具有特定的信息，有助于配合其他条件揭示此书的考辑情况。<sup>[1]</sup>

近十年来，与《封泥考略》形成相关的稿本陆续被发现与整理。2008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》，影印《汉官私印泥封考略》稿本（以下简称“上图稿本”）三卷（原装一册）（图3），对我们厘清《封泥考略》的形成背景具有重要的揭示作用。2013年潍坊市博物馆在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中，发现陈介祺批注校订《汉官私印泥封考略》稿本（以下简称“潍坊稿本”）一册（图4），现藏潍坊市博物馆。它的发现，为我们研究两个稿本之间的关系，以及与刊印《封泥考略》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依据。

与此同时，围绕着两个稿本以及《封泥考略》的研究成果也为我们深入研究提供了诸多线索。如孙慰祖作为封泥研究的专家，将“上图稿本”和《封泥考略》进行分析梳理，撰写“上图稿本”解题及《〈封泥考略〉与〈汉官私印泥封考略〉》，对《封泥考略》编纂过程及其陈、吴两家藏品的状况做出了初步探究。囿于其他原因，孙慰祖或许未曾注意到“潍坊稿本”的存在，进而缺失对两个稿本异同及相关信息的分析比较。另如潍坊市博物馆研究员杜晓军，将馆藏“潍坊稿本”与

[1] 孙慰祖：《〈封泥考略〉与〈汉官私印泥封考略〉》，《西泠艺丛》2022年第3期，第10页。

《封泥考略》相较,撰写《〈汉官私印封泥考略〉稿本与〈封泥考略〉比较研究》<sup>[1]</sup>,通过梳理两者之关系、比较两者之异同,揭示“潍坊稿本”对《封泥考略》的总成研究有重要意义。然作者虽知晓“上图稿本”,却未将其置于封泥整体发展过程进行梳理,不免有局限性。再如,西泠印社出版社副编审张月好撰写的《〈封泥考略〉三种稿本比较》,将“上图稿本”“潍坊稿本”和国家图书馆藏《封泥考略》进行比较,只是各稿本情况的简单概述,并未深入探讨。此外,台湾成功大学研究生郑宇清所撰写的硕士论文,从《封泥考略》的作者、版本和辑录封泥数量出发,对相关问题进行辨析,虽有创建,但仍以《封泥考略》为主体,未涉及稿本之间的比较。

因此,本文以“上图稿本”“潍坊稿本”为中心,对两种稿本状况进行梳理,兼及吴、陈二人的封泥收藏,厘清稿本之间的关系,同时从稿本内容出发,探讨与刊印《封泥考略》的相关问题,从而揭示《汉官私印泥封考略》稿本的重要价值与意义。

## 一、《汉官私印泥封考略》稿本概况和吴、陈二人的封泥收藏

由前可知,《汉官私印泥封考略》稿本现存两种,一是已经影印出版的“上图稿本”,二是尚未全部公开且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陈介祺手批注校订“潍坊稿本”。现将两种稿本分别进行概况。

上海图书馆藏《汉官私印泥封考略》稿本,由陈介祺手书文字、凡例、职官表、陈介祺增补新获封泥目、总目和正文组成。正文部分共三卷(原装一册),卷一为原题卷上及卷中,收录为官印;卷二为原题卷下,收录为官印;卷三为私印。确定了官印以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为据,地方郡县官印的编次参照《汉书·地理志》所载,私印附后,私印封泥多数为陈介祺所藏,最初并未将私印列入总目,而另置《汉私印泥封考略》,即卷三,故校订后总目改定为《汉官私印泥封考略》。据统计,该稿本收录吴、陈二人所藏官私封泥近600枚,其中陈介祺所藏350枚左右,以小字“陈藏一”“陈藏二”进行标记,列于泥封下方。正文由工整的小楷书写,非陈介祺笔迹,但有陈介祺手书眉批、旁批,以及行书书写的浮签粘贴至书中适当之类,这些浮签所记的内容均为陈介祺增、改封泥考释的文字。

除此之外,“上图稿本”中一则重要的信息是我们了解《封泥考略》成书过程的关键。卷首有陈介祺手书文字(图5)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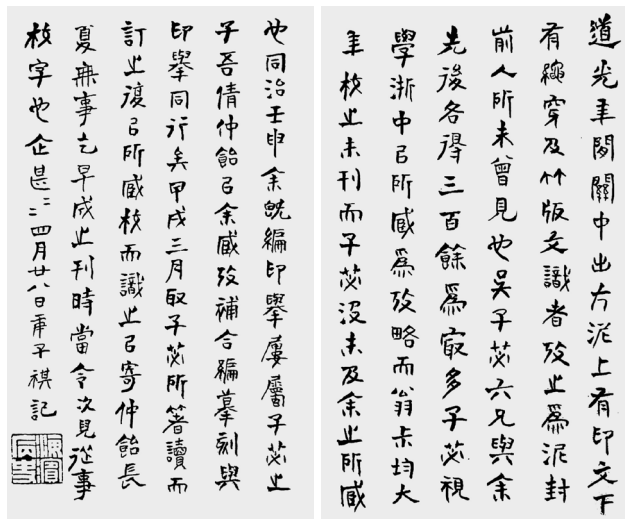


图5 “上图稿本”卷首陈介祺手书文字

[1] 潍坊市博物馆馆藏稿本中,陈介祺将全书“泥封”用对调符号改为“封泥”,因此该作者以《汉官私印封泥考略》命名,故《汉官私印泥封考略》和《汉官私印封泥考略》实为同一稿本。而本文为统一标准,均称为《汉官私印泥封考略》。



道光年间关中出方泥，上有印文，下有绳穿及竹版文，识者考之为泥封，前人所未曾见也。吴子苾六兄与余先后各得三百余为最多。子苾视学浙中，以所藏为《考略》，而翁叔均大年校之，未刊而子苾没，未及余之所藏也。同治壬申余既编《印举》，屡属子苾之子，吾倩仲饴以余藏考补合编摹刻，与《印举》同行矣。甲戌三月取子苾所著读而订之，复以所藏校而识之，以寄仲饴。长夏无事，乞早成之，刊时当令次儿从事校字也。甚企！甚企！四月廿八庚子祺记。

由该内容可知，吴式芬在咸丰四年至五年（1854—1855）任浙江学政，<sup>[1]</sup>以所藏封泥作《考略》，并由翁大年校订。然而咸丰六年（1856）十月，吴式芬卒于海丰家中，故《考略》未刊，也未及收录陈介祺所藏之封泥。其实早在咸丰元年（1851），陈介祺《簠斋印集》中已经辑入自藏封泥137枚，但未曾考释。至同治壬申（1872），陈介祺编纂巨制《十钟山房印举》时便嘱托吴式芬次子吴重熹（1838—1918），字仲悻（仲饴），也即其婿（咸丰己未，陈女适吴式芬次子吴重熹），加上自己所藏考补合编，与《印举》同传。

关于上述信息中所指的《考略》，据孙慰祖研究，为目前可知的吴式芬考释封泥的第二稿。<sup>[2]</sup>更早时，陈介祺于咸丰八年（1858）七月致信吴式芬长子吴重周时写道：“寄示汉封泥考一册，敬谢敬谢。”<sup>[3]</sup>虽此时吴式芬已谢世两年，但其子已将考释的成稿寄示陈介祺。在此之前，吴式芬于道光后期曾撰《海丰吴氏藏汉封泥》四册，收入官私印封泥原拓165枚，各页有吴氏释文考证手迹，原为横田实藏，今藏东京国立博物馆。<sup>[4]</sup>而此《海丰吴氏藏汉封泥》即目前已知吴式芬考释封泥的第一稿。

“上图稿本”是否在吴式芬第二稿基础上完成，我们暂无法确认。可以确定的是，“上图稿本”是经吴重熹增入陈藏部分并再加考补，又经陈介祺校订、补编的本子。<sup>[5]</sup>陈介祺是何时萌生将两家所藏进行合编并付诸行动，在陈介祺致金石友人的信中可略知一二。

陈介祺至迟同治十一年（1872）已萌生封泥合编的想法。“上图稿本”卷首陈介祺手书文字：“未刊而子苾没，未及余之所藏也。同治壬申余既编《印举》，屡属子苾之子，吾倩仲饴以余藏考补合编摹刻，与《印举》同行矣。”我们虽不能判断手书文字的确切时间，但在同治壬申（1872）前已经显现出陈介祺有合编的想法。同年九月致吴云信中提到：“汉印少朱文。近来出泥封之多，余与吴子苾阁学合存数百方，亦前人所未有，叔均曾略考之，若得佳工精刻，真足为朱文之矩矱，

[1] 孙才顺：《吴式芬金石年谱》，《西泠艺丛》2019年第9期，第21—22页。

[2] 孙慰祖：《汉官私印泥封考略解题》，《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》第三十册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6页。

[3] 陆明君著：《簠斋研究》，荣宝斋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149页。

[4] 孙慰祖：《汉官私印泥封考略解题》，《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》第三十册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6页。

[5] 孙慰祖：《汉官私印泥封考略解题》，《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》第三十册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6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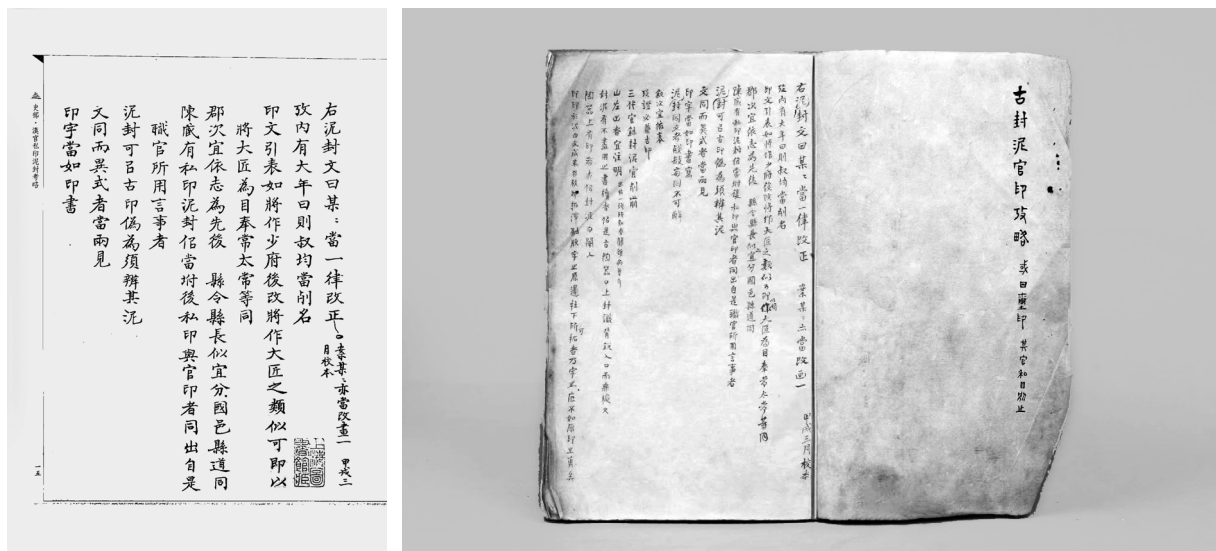


图6 “潍坊稿本”的卷首手写朱书，在“上图稿本”中用墨书工楷誊写

松雪不足道矣。”<sup>[1]</sup>以及“……惟泥封拓黏不易（合海丰吴氏，又倍于前），……”。<sup>[2]</sup>封泥的不断出土，虽使得二人封泥收藏数量剧增，但仍未进行合编，加之泥封特殊的材质而产生的拓黏不易，也更希望寻求佳工精刻。而后，陈介祺已开始谋划编刻工作。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二月，再次致信吴云：“泥封拟属小倩吴仲飴水部编刻，亦一巨观。”<sup>[3]</sup>另同治十二年三月致鲍康信中提到：“四十年来所收金文多至九百种，加之其有人赠予，或可得千，能刻此传之，即为至慰。如遇有好钩手及刻手，请先令刻一器后再议，泥封亦当先刻。”<sup>[4]</sup>以及同年八月，又致信鲍康：“弟与小倩仲飴之泥封六百余枚，未能刻附。”<sup>[5]</sup>最终，甲戌年（1874）二月分别致信鲍康与吴云提出，“并望仲飴作泥封考同刻传”，<sup>[6]</sup>“敝藏泥封与子苾阁学所藏共六百余，敦促仲飴考（旧有考）刻，与《印举》同传”。<sup>[7]</sup>三月，陈介祺终于取到吴式芬所著而订之，又以所藏校而识之，于四月寄还吴重熹。但是，陈介祺手中所校订的稿本究竟是哪个本子？我们或许可从“潍坊稿本”中寻找答案。

潍坊市博物馆藏《汉官私印泥封考略》稿本，全一册，线装，封面题“汉官私印泥封考略”书名，“泥封”二字用朱书符号对调，下书“甲戌校本”“己卯又校”，右侧篆书“光緒己卯余作印文曰‘簠斋藏古封泥’，‘封泥’文似胜‘泥封’，‘封泥’见《百官志》”。封二书“古封泥官印考略，或曰玺印、其官私目刊之”。正文和总目均为墨书小楷，卷首文字全部朱书，眉批、旁批、校注大部分为朱书，间有墨书，内容主要涉及书名确定、编次顺序、考释增补、封泥辨伪

[1] 清·陈介祺著，陈继揆整理：《秦前文字之语》，齐鲁书社1991年版，第220页。

[2] 清·陈介祺著，陈继揆整理：《秦前文字之语》，齐鲁书社1991年版，第226页。

[3] 清·陈介祺著，陈继揆整理：《秦前文字之语》，齐鲁书社1991年版，第230页。

[4] 清·陈介祺著，陈继揆整理：《秦前文字之语》，齐鲁书社1991年版，第153页。

[5] 清·陈介祺著，陈继揆整理：《秦前文字之语》，齐鲁书社1991年版，第170页。

[6] 清·陈介祺著，陈继揆整理：《秦前文字之语》，齐鲁书社1991年版，第188页。

[7] 清·陈介祺著，陈继揆整理：《秦前文字之语》，齐鲁书社1991年版，第264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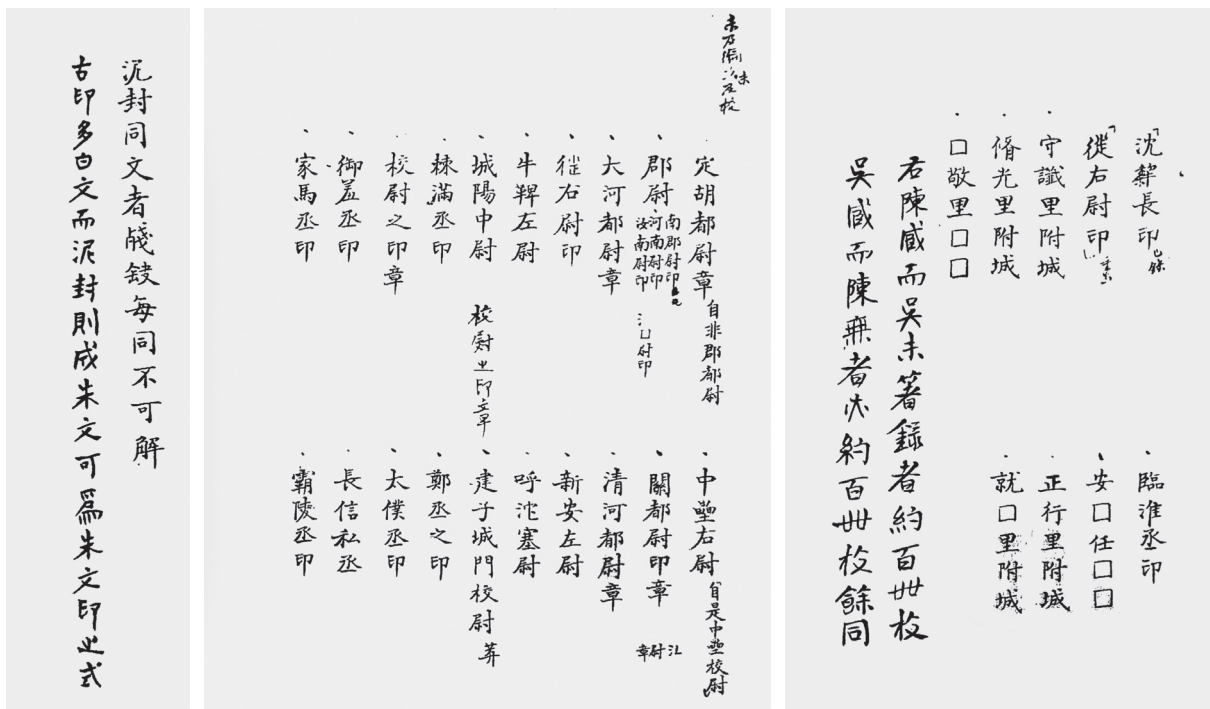


图7 “上图稿本”中陈介祺手批校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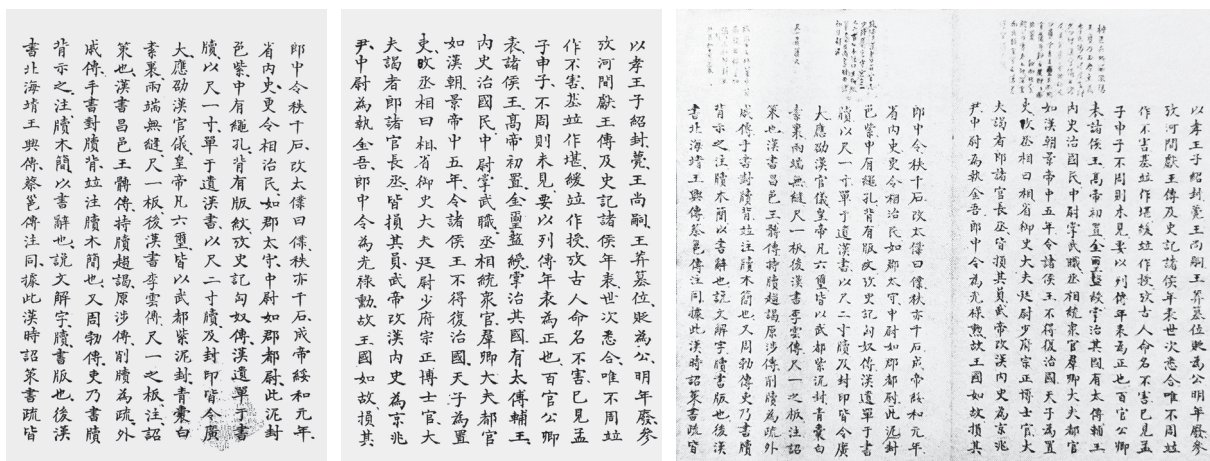


图8 “潍坊稿本”眉批有陈介祺手批校改

等。<sup>11</sup>

“潍坊稿本”封面上所记录的“甲戌”“己卯”，分别为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和光绪五年（1879），均为陈介祺墨书手写笔迹。此外，从目前该馆已刊布的图像资料看，并与“上图稿本”中同一内页进行比较发现：（1）“潍坊稿本”中陈介祺的卷首手写朱书，在“上图稿本”中用墨书工楷书写（图6）；（2）“潍坊稿本”中部分未著录的信息出现在“上图稿本”中（图7）；（3）“上图稿本”中部分未著录的信息出现在“潍坊稿本”中（图8）。

[1] 杜晓军、翟松岩：《〈汉官私印泥封考略〉稿本与〈封泥考略〉比较研究》，《陈介祺研究》，齐鲁书社2022年版，第1198页。



由此可初步判断,“潍坊稿本”似乎经过两次传递及校改,时间分别为甲戌年和己卯年,而“上图稿本”完成的时间恰在“潍坊稿本”两次校改的中间。

## 二、“上图稿本”成稿时间商榷

“潍坊稿本”的发现以及两次校改时间为我们确定了“上图稿本”成稿的大致时间,如何进一步缩小范围,我们可从材料中进行分析。

“潍坊稿本”未发现之前,通常认为陈介祺“甲戌三月”所校订的稿本即“上图稿本”,其实不然。“潍坊稿本”卷首有陈介祺朱书小字:

右泥封文曰某某当一律改正。(案,某某亦当改画一,甲戌三月校本。)考内有“大年曰”,则叔均当列名。印文引表如“将作少府”后改“将作大匠”之类,似可即以将(“以将”原写为“作”)大匠为目,奉常、太常等同。郡次宜依志为先后,县令县长似亦宜分,国邑县道同。陈藏有私印泥封似当附后,私印与官印者同出,自是职官所用言事者。泥封可以古印伪,为须辨其泥,文同而异式者当两见。印字当如印书写,泥封同文者残缺,每同不可解。

这段文字同样出现在“上图稿本”的卷首,内容基本相同,由工整的小楷书写,非陈介祺笔迹。同样,在“潍坊稿本”中,另有陈介祺朱书的增补封泥目,密密麻麻书写在一页上,如“定胡都尉府”“中垒右尉”“巨鹿太守章”……这些朱书墨迹同样出现在“上图稿本”中,由工整的小楷书写,并且按照一页两栏整齐排列(图9)。

由此可推测“上图稿本”应是陈介祺修改补充后寄给吴重熹,由吴重熹寻写手誊抄后的本子,则“上图稿本”应书于“潍坊稿本”之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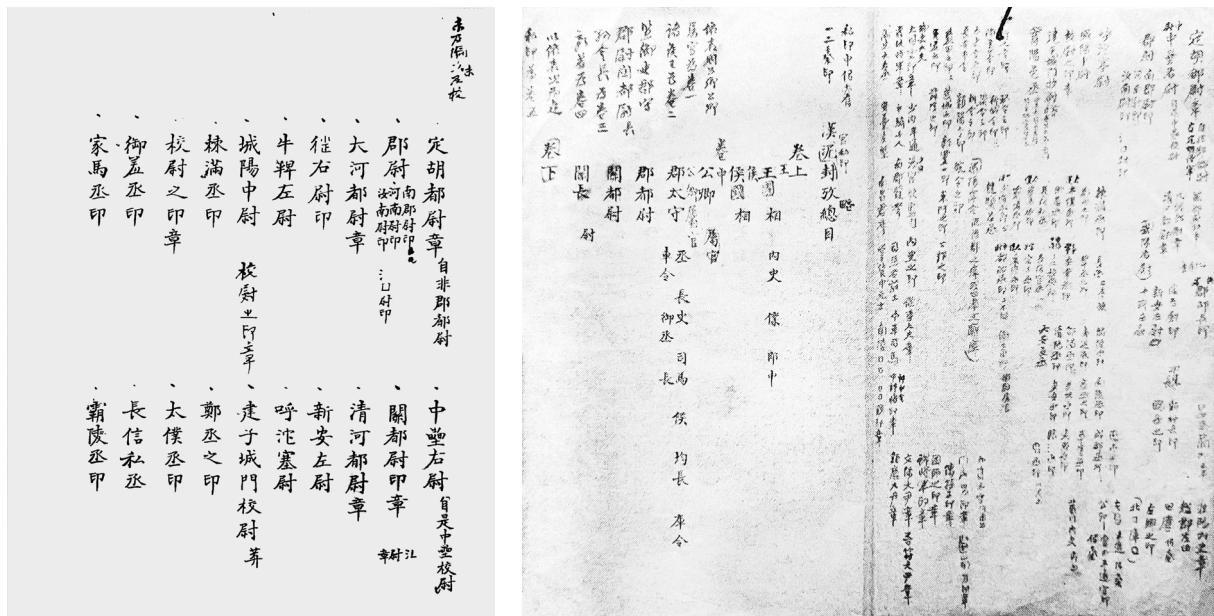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9 “潍坊稿本”陈介祺新增补封泥目与“上图稿本”新增封泥目的誊写

再回到“上图稿本”卷首陈介祺的手书文字，其所言“甲戌三月取子苾所著读而订之，复以所藏校而识之，以寄仲饴。长夏无事乞早成之，刊时当令次儿从事校字也。企甚！企甚！四月廿八日庚子祺记”。这段话似乎并不像专为此书所做题记，而更像是随手书写的一则笔记。因此，我们并不能以此判断“上图稿本”的书写时间是甲戌年（1874）。再者，“潍坊稿本”封面上出现的“甲戌校本，己卯又校”字样，右侧又有篆书“光绪己卯余作印文曰‘簠斋藏古封泥’，‘封泥’文似胜‘泥封’，‘封泥’见《百官志》”。这或许可以说明，陈介祺所言的甲戌三月读而订之、四月寄出的即“潍坊稿本”。

还原“潍坊稿本”“上图稿本”的成稿过程。同治十三年甲戌（1874）三月，陈介祺取吴重熹整理过的《考略》进行校补，在卷首补充上文提到的对于整体编目体例的修改意见，并用朱书小楷亲自书写，又在此页之后手写新获增补的封泥目，并调整部分目录顺序。完成以上工作后寄给吴重熹，吴重熹收到陈介祺甲戌“潍坊稿本”后，进行誊抄、整理等工作。之后，又将整理好的本子（即“上图稿本”）寄给陈介祺。陈介祺就“上图稿本”增入并补释新获封泥，以浮签形式粘贴并归于相从之类，同时对考释文字也进行补订（图10）。例如，“上图稿本”中吴重熹寻书手誊抄新增封泥目的眉批有“未及编次未及校”七字，结尾有“右陈藏而吴未著录者约百 册枚，吴藏而陈无者亦约百 册枚，余同”，证明陈介祺未有时间或精力对新获封泥进行编次及校订，而只是将每个封泥的考释以浮签形式归于相从之类，即“上图稿本”所见散落各处的浮签。另如，在第一页后补充“古印多白文而泥封则成朱文，可为朱文印之式”，并再次寄给吴重熹进行整理。（见表1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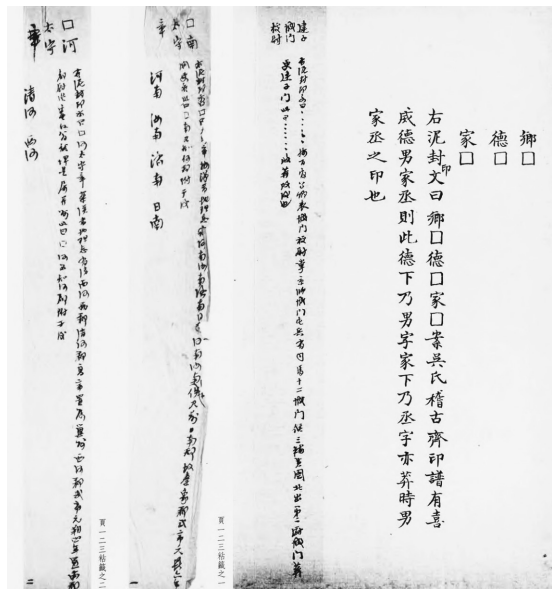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0 “上图稿本”中陈介祺考释校改的浮签

表1

所在页面	甲戌潍坊稿本	上图稿本
卷首编目体例	无	古印多白文而泥封则成朱文，可为朱文印之式。
新增封泥目的眉批	无	未及编次未及校。
新增封泥目的结尾	无	右陈藏而吴未著录者约百 册枚，吴藏而陈无者亦约百 册枚，余同。
汉官私印封泥考略总目	无	君当附侯国后，别为一类。
全文	无	新获封泥的考释以浮签形式散落书内各处

直至光绪元年（1875），陈介祺在正月、二月、三月三次致信王懿荣告知他泥封考可以索阅的消息：“仲饴处有校补封泥印文考，可索阅，不得，则倩胥录寄，与石查订正之。”<sup>[1]</sup>“仲饴处泥

[1] 清·陈介祺著，陈继揆整理：《秦前文字之语》，齐鲁书社1991年版，第96页。



封考，可索录存之。”<sup>[1]</sup>“封泥考当写寄，唯不可仿八比，琐事询过再复，止能随风气之后，而求此所无，不能如八比，求开风气之先。”<sup>[2]</sup>此时，吴重熹已经完成陈介祺在“上图稿本”中新增补泥封的考释及其他修改整理工作。

所以，至迟光绪元年正月，“上图稿本”已经成稿。加之陈介祺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甲戌三月读而订之、四月寄出的是“潍坊稿本”，基本可以断定，“上图稿本”成稿的时间为同治十三年四月（1874）至光绪元年正月（1875）之间。

### 三、“潍坊稿本”的两次校补

由“上图稿本”及“潍坊稿本”可知，陈、吴二人进行传递、修改的过程中，并不仅仅就一个本子来回传递，可以说他们的修改、整理是在多个稿本、多线进行的。

陈介祺甲戌年（1874）校补“潍坊稿本”后，于光绪五年己卯（1879）再次进行校补。此次修改，首先将全稿的“泥封”逐一校改为“封泥”，均用朱书颠倒符号表示，封面题签亦同。陈氏还在封面以墨书篆体补写：“光绪己卯余作印文曰‘簠斋藏古封泥’，‘封泥’文似胜‘泥封’，‘封泥’见《百官志》。”并在封二题写“古封泥官印考略，或曰玺印，其官私目刊之”。又在正文中眉批处墨书标注：“考《汉书·百官志》，少府属官，守宫令一人，六百石。本注曰‘主御纸笔墨，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’。”<sup>[3]</sup>咸丰二年（1852），刘喜海（1793—1852）就已为“封泥”正名或定名，然时人多有疑问，因此未得到普遍认可，陈介祺在第二次校补中终为“封泥”正名，并沿用至今。

其次，他还在卷首朱书小字后再次补充，使编目体例更加完备：

叙次宜依表，考证必兼古印。三代官玺封泥宜列前，山左出者宜注明，出非一地所知者，关洛齐鲁耳。封泥有不尽用之书牒者，似是古陶器口上封识，背锐入口而无绳文。陶器上有印者亦似封泥，勿阑入。印于泥，白文成朱，自校印拓□融，然字之原边在下，所可拓者乃字之底，不如原因之真矣。

最后，陈介祺也多对眉批进行补充修改，补充考释或增添封泥，与“上图稿本”并无重复之处。如“汉官私印封泥考略总目”一页，上面的眉批“依表则公卿、公卿属官为卷一，诸侯王为卷二，监御史、郡守、郡尉、关都尉长、县令长为卷三，新莽为卷四，以依表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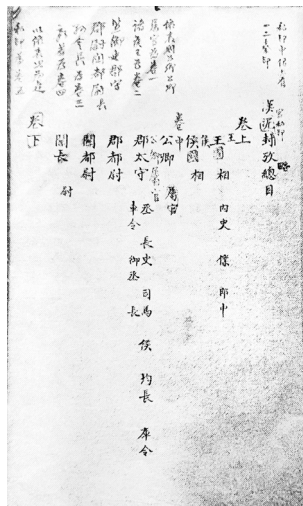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1 “潍坊稿本”内页

[1] 清·陈介祺著，陈继揆整理：《秦前文字之语》，齐鲁书社1991年版，第101页。

[2] 清·陈介祺著，陈继揆整理：《秦前文字之语》，齐鲁书社1991年版，第106页。

[3] 咸丰二年（1852），刘喜海、陈介祺以所藏封泥200余枚请胡琨考其是非。同年，胡琨辑录有《泥封印古录》，并自序云：“余疑为汉印之范，相传名为印封，不知所出。刘方伯援《后汉书》守令‘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’为证。”

为是”，这些小楷内容在“上图稿本”中悉数誊抄，而“私印为卷五”以及“私印中似亦有一二秦印”（图11）两处批注“上图稿本”并没有出现。另如在正文第一页“汉官印封泥考略卷上”上方进行眉批，朱书“印文摹刻则考中皆须释文”，朱书更小字“考字可省”；墨书小字在右“古封泥玺印文考略”“三代汉”“官印私印”。朱书字形较大，而墨书字形小且书写拥挤，可以推测朱书先写而墨书后写。也就是说，陈介祺在己卯年进行修改时，用了朱、墨两种颜色。（见表2）

基于以上三点，可再次证明陈介祺对于“潍坊稿本”甲戌年、己卯年的两次校补修改，一次发生在“上图稿本”前，是“上图稿本”的誊抄样本；一次发生在“上图稿本”之后，修改内容相较第一次少，但更涉及封泥考略的核心内容、成熟形式、编目顺序等，也为之后《封泥考略》的正式编写做足准备。

表2

所在页面	上图稿本	己卯潍坊稿本
全文	泥封	封泥
封面	无	光绪己卯余作印文曰“簠斋藏古封泥”，“封泥”文似胜“泥封”，“封泥”见《百官志》。
封二	无	古封泥官印考略，或曰玺印，其官私目刊之。
卷首朱书小字	无	叙次宜依表，考证必兼古印。三代官玺封泥宜列前，山左出者宜注明，出非一地所知者，关洛齐鲁耳。封泥有不尽用之书牒者，似是古陶器口上封识，背锐入口而无绳文。陶器上有印者亦似封泥，勿阑入。印于泥，白文成朱，自校印拓口融，然字之原边在下，所可拓者乃字之底，不如原因之真矣。
汉官私印封泥考略总目	无	私印为卷五 私印中似亦有一二秦印 公卿侯附城
正文第一页的眉批	无	印文摹刻则考中皆须释文。（朱书） “考”字可省。（朱书） “古封泥玺印文考略三代汉官印”私印（墨书）
正文第三页的眉批	无	考《汉书·百官志》，少府属官，守宫令一人，六百石。本注曰“主御纸笔墨，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”。

#### 四、“潍坊稿本”与刊印《封泥考略》的关系

己卯年（1879）陈介祺完成对“潍坊稿本”的第二次校补后，次年《封泥考略》进入编写阶段。<sup>[1]</sup>那么，“潍坊稿本”与《封泥考略》的形成有何关联，两者又有何异同？本节我们以稿本内

[1] 陈介祺于光绪六年（1880）七月致信吴云：“封泥于齐鲁间亦得一二，皆共吾兄赏之。唯陈州守小倩吴仲怡家藏五百余，仅见目考，未获拓本。考略甫编，尚未写毕，毕再写奉寄。弟事须躬亲，无文字之助，辟地之难如此。封泥出于印而非印，印范拔蜡法今失传矣。”

容为核心,从编目、拓制、封泥数量以及考释所存异同进行探讨,揭示“潍坊稿本”于《封泥考略》成书的重要意义与价值。

### (一) 编目

早在光绪二年(1876),吴重熹便受陈介祺嘱托,已初将《封泥考略》考订大概,并将录目寄陈介祺审定。《潍县陈氏旧札钞》记载,是年六月二十三日吴重熹致信云:“前寄来《封泥考略》并目,所未入者百四十种,日来编录略有眉目,其未考得者尚有二十七种,兹将录目寄呈。祈鉴定寄下。”同时,还记录了编纂、考订、拓制的事宜:

京中亦以一目交莲生(廉生)托其代考。婿手下无书,只就班书一检,故多未及也。须一例按次后方可写清本、次序,自以按《汉书》为是,而一动原书之次序,则注之前详后略者,须大动一番手方能无病。且传钞多则讹易生,此亦不易也。且必须对拓本一校,方可写清本,同文者共几方须与留出地步,且须校字画有无谬错,即以二十七方内之“大安长永”,累查无“大安”地名,窃疑恐是“六安”,此非审拓本不可,倘非“大安”,则虚费此一番精神矣。祈检尊藏泥封,属东山、同山速精拓二份,遇便寄下,一留上木,一粘本作为校勘底稿缮本,有沿讹者即可随手更改。最为紧要,婿考得者,即随便夹条于册内,必须早誊清目方好,恐日久则亦自忘之也。<sup>[1]</sup>

由“上图稿本”和“潍坊稿本”的传递校改我们已知陈、吴二人对于封泥的修改、整理是多个稿本、多线进行的,在此封信中同样得到验证。光绪二年(1876)介于“上图稿本”和己卯年(1879)“潍坊稿本”之间,然涉及封泥的原拓在两个稿本中均未得见。故而可以猜测,此时二人传递的应是所未见的其他本子。而后从己卯年“潍坊稿本”卷首陈介祺所补充的朱书小字体例以及总目所增加的“私印为卷五”可知,陈介祺对编目的修改幅度并不大,但从《封泥考略》的成书上看,后者表现出更加严谨且合理化的编次方式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:

1. 编次更趋完备细化。“潍坊稿本”总目分五卷,以大类进行划分;《封泥考略》总目分十卷,大类下又分若干小类。(见表3)

2. 《封泥考略》较“潍坊稿本”收录封泥种类及数量有所增加。“潍坊稿本”所收封泥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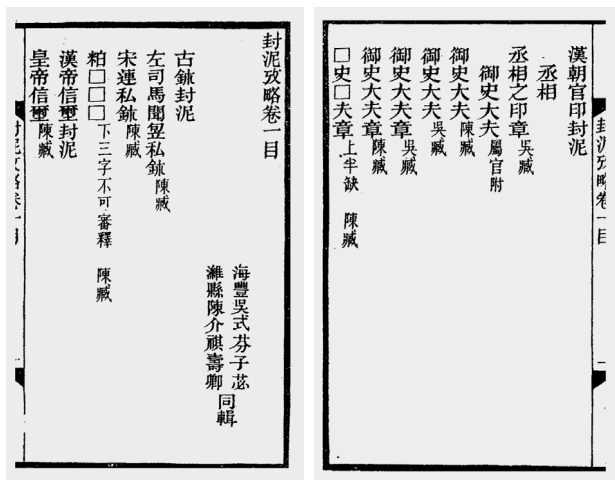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2 《封泥考略》目录

[1] 陆明君著:《陈介祺年谱》,西泠印社出版社2015年版,第333页。



“诸侯王玺印封泥”为卷一；《封泥考略》则以“三代封泥、汉帝信玺封泥、汉代官印封泥”为卷一（图12），这些均是陈、吴二人新增补的封泥，且涉及的官制也较齐全。

表3

潍坊稿本	《封泥考略》
依表则公卿、公卿属官为卷一，诸侯王为卷二，监御史、郡守、郡尉、关都尉长、县令长为卷三，新莽为卷四，私印为卷五。	第一册为古玺封泥、汉帝信玺封泥、汉代官印封泥； 第二册为汉诸侯王玺印封泥、汉侯印封泥、汉侯国官印封泥； 第三、四册为汉郡国官印封泥； 第六册为汉县邑道官印封泥； 第七册为汉县邑道官印封泥、汉县邑道无官名印封泥、汉县邑道掾史印封泥、汉县邑道乡官印封泥； 第八册为新莽朝伪官印封泥、新莽郡国伪官印封泥、新莽县邑道伪官印封泥、新莽伪封侯子男印封泥、新莽族女伪封号印封泥、新莽诸侯以下母妻伪封号印封泥、新莽伪封家丞印封泥； 第九册为新莽伪封号印封泥； 第十册为汉臣名印封泥、汉妾名印封泥、汉私印封泥。

## （二）拓制

“上图稿本”和“潍坊稿本”只见封泥及考释，未见封泥原拓，而《封泥考略》两者兼有，且从上海博物馆藏底本中纸、墨差异及信札往来可知陈、吴两家墨拓是分开进行的。<sup>[1]</sup>

同治末年，陈介祺敦促吴重熹编刻泥封考略与《印举》同传，此时两家共藏有封泥合600余枚。光绪元年（1875），陈介祺致信吴大澂，拓得泥封三百余，<sup>[2]</sup>次年又曰：“泥封敝藏者拓毕，唯小倩仲饴水部旧藏拓不至，合之六百余。子苾有成书，再有亦当补入。”<sup>[3]</sup>同年，陈介祺还告诉吴大澂，东土竟亦有泥封，文曰“姑幕丞印”，未及拓。<sup>[4]</sup>直至光绪五年（1879），再次致信吴大澂，附上其封泥拓全分五百余纸。<sup>[5]</sup>短短三年时间，陈介祺收藏封泥的数量增加至500余枚。至光绪六年（1880），吴重熹所藏也已达500余枚，可惜仅见目考，未获拓本。<sup>[6]</sup>

## （三）封泥数量

从“潍坊稿本”两家计600余枚，到光绪六年（1880）计千余枚，再到《封泥考略》共收录846枚，两家虽都未全部进行辑入，足以在近代为海内之冠。

[1] 孙慰祖：《〈封泥考略〉与〈汉官私印泥封考略〉》，《西泠艺丛》2022年第3期，第14页。

[2] 清·陈介祺著，陈继揆整理：《秦前文字之语》，齐鲁书社1991年版，第289页。

[3] 清·陈介祺著，陈继揆整理：《秦前文字之语》，齐鲁书社1991年版，第289页。

[4] 清·陈介祺著，陈继揆整理：《秦前文字之语》，齐鲁书社1991年版，第289页。

[5] 清·陈介祺著，陈继揆整理：《秦前文字之语》，齐鲁书社1991年版，第289页。

[6] 陈介祺于光绪六年（1880）七月致信吴云：“封泥于齐鲁间亦得一二，皆共吾兄赏之。唯陈州守小倩吴仲饴家藏五百余，仅见目考，未获拓本。考略甫编，尚未写毕，毕再写奉寄。弟事须躬亲，无文字之助，辟地之难如此。封泥出于印而非印，印范拔蜡法今失传矣。”



图13 《封泥考略》“淄川王玺”封泥增补的考释内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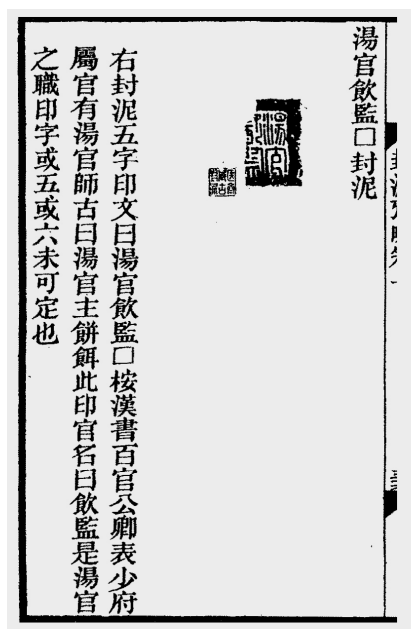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4 《封泥考略》“汤官监”封泥考释内容更加简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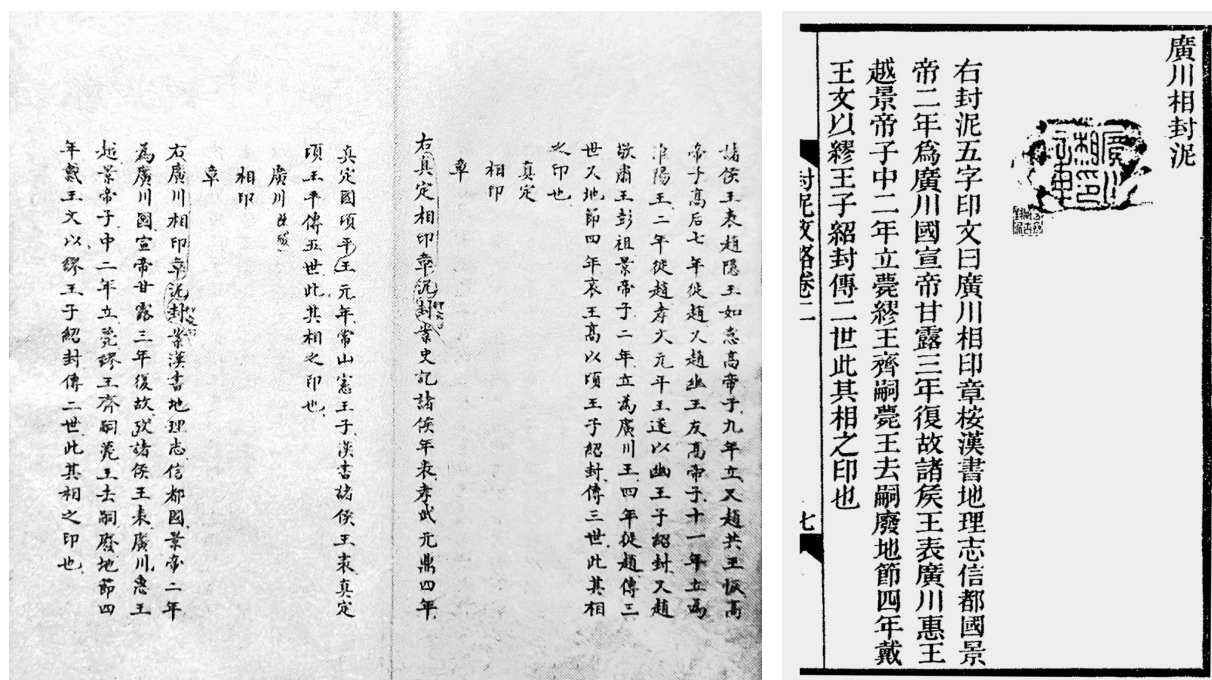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5 “潍坊稿本”与《封泥考略》考释体例对比

“潍坊稿本”收录封泥近600枚，其中陈藏350枚左右；《封泥考略》收录封泥846枚，其中陈藏575枚，吴藏271枚。陈氏所藏溢出稿本百余枚，当有光绪年间新获封泥，而吴藏仅有实际的一半，孙慰祖则认为，吴重熹在编入《封泥考略》时做了严格的鉴定和筛选。<sup>[1]</sup>

[1] 孙慰祖：《〈封泥考略〉与〈汉官私印泥封考略〉》，《西泠艺丛》2022年第3期，第12页。

#### （四）考释及考释体例

将“潍坊稿本”与《封泥考略》的考释文字对比发现，后者又做了进一步改订，使之更加科学严谨。如：“淄川王玺”下，《封泥考略》增入文字“簠斋陈氏藏‘淮阳王玺’，是白玉者，非金，与《百官公卿表》异”（图13）；“梁于里附城”下，《考略》增入文字“新莽里名，今不可考，古‘庸’‘墉’一字，附城即仿古附庸文，附于五等之封，里名即所食之邑以里计者也”；陈藏“汤官饮监”，簠斋释曰：“按《百官公卿表》，少府，秦官，有六丞，属官有尚书、符节、太医、汤官、导官、乐府、若庐、考工室、左弋、居室、甘泉居室、左右司空、东织、西织、东园匠十二官令丞。师古曰：汤官主饼饵。饮监，义未详。”《封泥考略》简作：“少府属官有汤官。师古曰：汤官主饼饵。此印官名曰‘饮监’，是汤官之职印，印字或五或六，未定也。”<sup>[1]</sup>（图14）

同时，考释体例方面，《封泥考略》在“潍坊稿本”的基础上逐步补充及完善。如“广川相印章”这枚封泥，未经考订前，考释的起始语体例为“右+印文+泥封”，如“右广川相印章泥封”；甲戌“潍坊稿本”校订为“右+泥封印文曰+印文”，如“右泥封印文曰广川相印章”；己卯“潍坊稿本”将“泥封”二字对调，即“右封泥印文曰广川相印章”；《封泥考略》中，又改订为“右+封泥+字数+印文曰+印文”，如“右封泥五字印文曰广川相印章”，可见其厘定的规范化、合理化。（图15）

综上所述，“潍坊稿本”对《封泥考略》的最终成书提供了多方面、多层次的基础信息，两者既有一脉相承的关系，亦有在进一步梳理、增订、调整过程中造成的差异，但更多体现出陈、吴二人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。

## 五、结语

以“上图稿本”和“潍坊稿本”为中心，通过对《汉官私印泥封考略》稿本进行梳理和考察，确立了“潍坊稿本”经过两次传递及校改，时间分别在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和光绪五年（1879），而校补时间的确定也为“上图稿本”的成稿时间提供了依据。此外，在“潍坊稿本”完成第二次校补后，光绪六年（1880）《封泥考略》进入了编写阶段，于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得以正式印行。同时，通过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，从编目、拓制、封泥数量及考释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梳理，可知两者既一脉相承，又有在逐步完善、梳理过程中造成的差异。但基本可以断定，《封泥考略》是以“潍坊稿本”为基础，在更加严谨、更加科学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部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金石学著作。这部中国古代封泥研究的开山之作，集吴、陈两家两代人之力，前后承接而得以完成，在学术史上影响深远，更极大地促进晚清金石学的发展与深入研究。因此，我们不能忽视《汉官私印泥封考略》稿本的重要性，也希冀“潍坊稿本”能够有更多的图像信息公诸于世，为封泥及相关稿本研究提供更多新鲜的材料。

（作者一供职于上海书画出版社；作者二供职于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）

[1] 孙慰祖：《〈封泥考略〉与〈汉官私印泥封考略〉》，《西泠艺丛》2022年第3期，第12页。